



中国通

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新 华 出 版 社

中 国 通

(美) 伊 · 卡 恩 著

陈 亮 隋丽君 林楚平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本书译者

1——4章	陈亮
5——9章	隋丽君
10——13章	林楚平

中国通

〔美〕伊·卡恩著

陈亮 隋丽君 林楚平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42,000字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203·006 定价: 0.97元

出版说明

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批年轻的美驻华外交官，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事业心很强。他们大多数人努力学习汉语，熟谙中文，广泛和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曾被誉为“美国驻国外的一批最能干的年轻外交官”。他们有正义感，能客观地看待中国当时的局势发展。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关于共产党的宣传，积极主张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对解放区作实地了解，有的人参加了这个观察组。他们由于对蒋管区和解放区都有真切的了解，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我党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有过一些接触，比较正确地估计到我党我军的真正力量，预见到我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前途，于是在他们向美国政府呈送报告中客观地反映了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消极抗战的情况，反对美国片面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提出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但就是因为这些，他们当时就受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粗暴压制，在新中国诞生后更成为美国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对象，说他们是“丢失中国”的罪魁祸首。他们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普遍受到公开的与

秘密的审查，有的丢了官，有的被调离，有的改行或失业，备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们的子女和亲友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其中尤以谢伟思、戴维斯的遭遇更为令人同情。直到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中美建立关系，他们的不幸遭遇才算过去，问题也才逐渐得到解决。

本书写的就是这一批外交官这段坎坷的经历。作者以丰富的材料，犀利的文笔，描述了当时美国统治集团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彼此推卸责任、互相攻讦的情况；揭露了参议员麦卡锡之流进行政治迫害的种种鬼蜮伎俩，以及赫尔利、杜勒斯等人在这场政治迫害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指出腊斯克“明哲保身”态度；记述了受害者所遭到的精神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物质生活上的艰难困苦，等等。

在人类社会，古今中外，冤案冤狱是屡见不鲜的，但它发生在标榜“民主”的美国，而且历时二十年之久，美国本身也因错误估计了形势，而终于从顶峰跌落下来，这是令人深思的。

作者伊·卡恩是美国《纽约人》周刊的撰稿人，一九七三年曾来我国访问。他除了为该刊撰文外，还写过好几本书。

作 者 的 话

在人们记忆中，亨利·基辛格使美国及其一些外交官重新结识中国，可能是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最了不起——也许是唯一——的成就。本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重新认识一些美国外交官，那些外交官，要是早先几届政府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本来是有可能大大影响或至少是保持他们的国家和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二十世纪中叶的关系。

对新闻记者和学者来说，使旧事再现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探究有案可查的记录。但是，本书所写的，有相当多却是亲自采访从前的驻外处官员的结果，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中国发回的颇有见地的报告，基本上没有受到注意，而且他们本人由于发回了不合乎自己在华盛顿的上司的胃口的报告，都在不同程度上吃了苦头。

我谨感谢许多向我提供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和见解的先生女士们的帮助，其中有包大可、戴维·皮尔奇克、希拉·考克斯、约翰·费正清、威尔玛·费正清、艾德里安·费希尔、斯图尔特·盖茨、马克斯·格拉尼奇、马歇尔·格林、马海

德医生、约翰·霍尔德里奇、查默斯·约翰逊、乔伊丝·霍尔格伦、乔治·凯南、赫伯特·莱文、菲利普·利连撒尔、加里·梅、弗吉妮亚·麦科密克、约翰·梅尔比、雪莉·纽霍尔、朱利叶斯·皮尔逊博士、约瑟夫·劳、约翰·里德、杰拉德·赖利、爱德华·雷茨夫人、哈罗德·罗塞尔、亚历山德拉·施努尔曼、菲利普·谢伟思、罗伯特·谢伟思、沃尔特·萨里、詹姆斯·汤姆森、莱曼·范斯莱克、伯顿·沃恩夫人、约翰·卡特·文森特夫人、小约翰·卡特·文森特、白修德、艾伦·惠廷、克利福德·扬，还有——显然是把最先的放在最后提——唐纳德·芒罗，如果不是他的催促和介绍，我也许根本不会见到任何一位老中国通。

不过，假如没有本书所写的诸位的慷慨合作，本书也是不可能写成的，因此，我谨向由于耐心地提供关于他们在处境好和不好时的回忆而值得专门提出的诸位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是：罗伯特·巴尼特、包瑞德上校、奥利弗·埃德蒙·柯乐布、唐纳德·戴维斯、小约翰·佩顿·戴维斯、埃弗雷特·德鲁姆赖特、约翰·埃默森、麦克拉肯·费希尔、富尔顿·弗里曼、雷蒙德·卢登、詹姆斯·彭菲尔德、爱德华·赖斯、阿瑟·林沃尔特、劳伦斯·索尔兹伯利、约翰·谢伟思、理查德·谢伟思和菲利普·斯普劳斯。他们从各方面促成此书写成。

伊利·雅克·卡恩

目 录

作者的话

- 一 “这句话用中文怎么讲？” (1)
- 二 “象他们这样的人我们今天一个也没有了。” ... (34)
- 三 “为别人服务不仅是责任，而且是荣誉。” (59)
- 四 “有我在，就有领事馆在。” (93)
- 五 “我本打算反驳大使，但是……” (128)
- 六 “查理，抽它另一边！” (172)
- 七 “担任驻外工作并非乐事。” (209)
- 八 “抓住确有证据和有案可查的事实。” (240)

九 “哎呀，麦卡锡这样搞可危险。”(276)

十 “让历史来做我的审判官。”(318)

十一 “听着，这家伙会不会是个共产党？”(345)

十二 “命运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转折。”(367)

十三 “到这里来感到很高兴。”(378)

一 “这句话用中文怎么讲？”

一九六〇年将近年底，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在总统竞选中举行了四场著名的电视辩论。两人似都全神贯注的大问题是金门和马祖的命运。这是位于亚洲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之间的两个小小的岛群。关于美国对金门和马祖可能或应该怎么办，两位候选人的意见有分歧，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因为在那个历史时刻公开持任何别的态度都几乎是政治自杀——毫不动摇地支持蒋介石统辖他在台北的共和国，对于美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一九六〇年秋，美国的许多事情都要受对华态度的影响。就在那时候，埃弗雷特·德鲁姆赖特当了美国驻台北的大使；爱德华·赖斯则是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的一个成员，他在肯尼迪赢得大选一年之后还当上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除了那些差不多只潜心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们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知道德鲁姆赖特和赖斯，但是他们担任着他们该担任的职务这一点，倒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他们是外交官中仅有的两位中文专家，在自己的领域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的经验而仍然做着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战争爆发时，有二十多位象他们这样的专家在工作。但是，在战胜日本后的十五年——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国取代蒋以后的十一年——里，外交官中的其余“老中国通”都被陆续调走或撵走而不得参与重大的对华事务了，其理由是他们对“丢失”中国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丢失中国的并不是他们。他们当时的权限既丢不了也保不住中国。中国是经历了一场剧烈的也许是无法制止的革命之后被蒋介石丢掉而被毛泽东得去的。如果说有什么外界影响因为帮助毛泽东取得胜利而值得表彰的话，那么三十年代日本的侵略行径肯定要使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美国外交官的失职或尽职行为黯然失色。要是把蒋的垮台归咎于美国人，大概也不应归咎于任何职业外交官，而是应归咎于一位狂妄自大的非职业外交官，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被罗斯福任命为驻蒋介石的首都重庆的大使赫尔利少将。从那一天起，美国两大政党都觉得自己已同中国问题缠在一起，无法摆脱——对民主党说来，是因为他们主要被指责说他们起了丢失中国的作用；对共和党说来则因为这些指责主要是他们提出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国务院内有一个亲共集团……一有机会就宣传共产党在中国的事业。”塔夫特有时候被人们认为是共和党的良知，而且无可否认地是该党高级发言人之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要共和党人阿瑟·范登堡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他说，蒋介石“被出卖了。”

可笑的是，从来没有任何美国人——除非是那个约翰·里德，他不是外交官——被指责丢失了俄国。乔治·凯南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被排斥在任何与美苏关系有关的事情之外，并不是因为他过于容忍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过于反共。

中国的丢失成了美国外交神话中被人念念不忘的事，以致于联系到后来共产党的成就时，常常要提起。因此，一九六〇年秋，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希望尼克松击败肯尼迪的人领导并担任委员的调查小组——发出一份新闻公告说，“古巴是被各种各样的美国人交给卡斯特罗和共产党的，就象把中国交给共产党一样。”几个月之后，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参议员托马斯·多德在谈到广为流传的关于国务院对卡斯特的革命曾助了一臂之力的指责时说，“我无意惩罚任何人。我要说的是，我相信这些人只是判断错误。我不想再说别的。但是我确实想说，我们决不能再做这种事，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不会连续犯这种错误的人安排在国务院。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丢掉了中国……”

到一九六〇年时已被惩罚了很久的中文专家之一约翰·卡特·文森特，在一九五三年初春曾向刚刚成立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主动提出过意见。文森特说，“作为一个所谓的老中国通，我建议新政府抱着很真诚的目的调查研究关于我们‘丢失’中国的说法。这完全是院外援华集团捏造散布的说法。请抛弃它吧。那时，也只有那时，政府才能在职外交官

的帮助下，制订并执行——我们希望——客观的对华政策，而职业外交官也不用再担心是否忠于蒋介石就是是否忠于美国这种考验。”

当时如果听取文森特的意见，本来可能是万无一失的。

（几个月后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揭示，只有百分之七的美国人认为驻外处官员丢失了中国，而多得的人则认为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虚弱。）但是，新的共和党政府非但没有抛弃老想法，却一下子把文森特开除了。

另一个老中国通是谢伟思，他在“丢失中国的人”的名单上始终名列前茅，尽管不要丢失中国的想法在他思想上一直占很大的地位。例如，在赫尔利被任命为大使前八个月的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谢伟思向他的上级写报告说，“中国的情况一团糟……蒋介石，也只有蒋介石要对整个这种不幸的局面负责……如果他所依赖的美国下定决心究竟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然后对这种要求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这可能意味着积极参与中国内政。但是，我们要是不这样做，就无法把中国当作盟国。而我们这样做，却有可能挽救中国。”

谢伟思也被赶出了政府，不过，多亏最高法院，他在非自愿地离职六年之后勉勉强强地被恢复了国务院的职务。谢伟思也许是所有老中国通中被搞得最臭的，他在一九六〇年五十岁并且身体非常健康时，就经常在想自己死后的讣告大概怎样写。他觉得十分肯定的是，讣告将称他是被控失去中国的人之一，称他是一九四五年他三十五岁时著名的“《亚

美》杂志案件”中最具体地被控犯有间谍罪的人。讣告肯定还要写上他姓名的第二节斯图尔特，他自己几乎从来不使用这一节，但是诽谤他的人似乎一致认为这一节名字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邪恶的网。

此外，反复使用“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起到了把本人与他的两个主要同事——约翰·卡特·文森特和约翰·佩顿·戴维斯——组成一个名字阴谋网的作用。确实，到了一九六〇年，也许有相当多的不大注意外交史的人已经分不清这三个人，更不用说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如外交官约翰·肯尼思·埃默森、老前辈汉学家约翰·费正清、竹幕放下前的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另一个外交官，其经历与谢伟思、文森特和戴维斯大致相仿，从逻辑上讲本来是可能被别人把他同他们三人联系在一起的，但恰恰因为他名字不同而不那么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字叫奥利弗·柯乐布。反之，有一位右翼作家、主持蒋介石和宋美龄婚礼的传教士的第二个妻子杰拉尔丁·菲奇，一度却曾经把谢伟思、文森特和戴维斯同一位并非中国问题专家的驻外处官员联系在一起，显然只是因为这位外交官的名字叫约翰。

到一九七一年，谢伟思可以苦笑地谈论这一切由于名字的混乱造成的笑话了。在美国与人民共和国和解后，谢伟思同戴维斯和费正清一起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他回想起过去有人曾经把蒋介石的中国的覆亡归咎于四个“约翰”——谢伟思本人、约翰·戴维斯、约翰·费正清和“约翰”

介石。他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约翰的英语发音与蒋近似——译者注）

但是，名字的搅混并不总是引起乐趣的。总是在找谢伟思的岔的南京教区罗马天主教代理主教兼嘉定教区主教于斌发表的关于谢伟思的言论就是例子。于斌主教在紧张的战争时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并没有同他管辖的教徒一起呆在中国，而是呆在美国替蒋介石作宣传，他硬说谢伟思到过莫斯科，在那里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出了力。作为一个象谢伟思那样的外交官，到莫斯科去一次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恰恰是他从未踩上过苏联的国土。约翰·戴维斯曾被派去莫斯科工作过一段时期，但是帮助美国的事业，于斌十分可能把约翰·戴维斯当成是约翰·谢伟思。

谢伟思的朋友们并不叫他“约翰”，而是叫他“杰克”，他对这种在名字上搞的低级趣味表示不屑理睬。他长期以来已习惯于那种事情。

谢伟思喜欢说他有三个时期的生活。第一个时期从他一九〇九年出生到惨痛的一九四五年，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他在中国，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从事学习研究。第三个时期于一九六二年开始，这个时期也致力于研究中国情况，其中有非常兴奋的六个半星期，他回到了中国。第二个时期十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过着湮没无闻的生活。在那个时期以前和以后，他同共产党中国的最高级领导人进行过广泛的谈话，在战争期间，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了解的极少数美国外交官之一。北京未来的统治者渐渐产生好感而且似乎

表示信任的这位外交官是宁静、庄重、坦率和有同情心的，他代表了美国最优秀的一面，这一事实本来是可能对他的国家非常有用的。

确实，如果华盛顿的当权者中有人不仅不嘲弄谢伟思是另一个丢失中国的人，而是注意他一九四四和四五年写回的关于同共产党首脑们谈话的报告，注意他和他的外交官同僚在那个时期前后提出的一部分报告，历史本来是可能发生不同转折的。大部分报告当时都说，不管他们或其他任何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什么希望，不管他们或其他任何人多么希望蒋介石保持对统一的中国的控制，蒋委员长和共产党的斗争，蒋介石是输定了的。这些老中国通是正确的，但后来贬损他们的人却认为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些贬损者不能看出预言可能发生的事与希望发生这种事之间的差别。在谢伟思处于湮没无闻的年头中，对他的一部分比较残酷的攻击是指责他个人某种程度要对朝鲜战争中美国男儿的死去负责。事实是，如果当时听了他的意见，如果美国当时对中国及其共产党采取现实的看法，本来就不可能发生什么朝鲜战争。

此外，尽管谢伟思没有过份地谈起自己不愉快的过去，但是他却在一九七一年提出，如果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有任何处在当权地位的人考虑他和其他了解情况的中国通当时提出的报告，本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台湾问题。他写道，“毛泽东的中国如果以不同的方式取得政权，而且不被敌对的西方孤立，就可能处在完全不同的地位。例如，中美乒乓赛可能成了正常的事情，而不会成为震撼世界的大事。”大约与

此同时，一位日本电视评论员请谢伟思谈谈对美国和中国战后错综复杂关系的想法。谢伟思回答道，“我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一九七四年他的战争时期通信集出版时，书的题名是《在中国失却的机会》。

试图毁掉谢伟思和其他“丢失中国的人”的那些家伙，是一些职业杀人者：参议员乔·麦卡锡、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以及给他们当告密者、调查员和顾问的卑鄙的男男女女，他们有时象棒打兔子一样残酷无情。象其它军队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牧师，他们干杀人勾当得到虔诚的祈祷者的支持，而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这样一些人物则佯作不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在谢伟思、文森特和柯乐布已经离开国务院以及戴维斯每况愈下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国务院说，“如果有任何组织应该具有最高士气，坚定地深信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不管批评者或反对者怎么说都必须取得出色成就的士气，基于高度信仰一项事业的士气，那就应该是驻外处和国务院。”这番意见的措词拙劣，带有真正的艾森豪威尔作品的调子。总统没有提起，报考驻外处官员的总人数已从他当选那年的二千七百零一人减少到一千二百六十一人。

事实是，国务院的士气很糟，驻外处的士气更糟。提到中国状况的时候，要是不引用蒋委员长嘴里说出来的话，就要受到怀疑。例如，国务院有一位女办事员是处理“中华”问题的，这是当时仍然争论未决的哪个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